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著
高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著
高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著；高钰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7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书名原文：Unequal Development：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ISBN 978-7-5201-0052-6

Ⅰ.①不… Ⅱ.①萨… ②高… Ⅲ.①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Ⅳ.①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2326号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著　　者／［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译　　者／高　钰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编辑／仇　扬　王小艳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25　字 数：37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01-0052-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8268号

定　　价／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Samir Amin.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Samir Ami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经萨米尔·阿明授权由英文版译出。版权所有。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名　王　巍　李　扬　李　强　李永全　李剑鸣
李培林　张宇燕　张异宾　陆建德　陈春声　卓新平
罗志田　季卫东　周　弘　胡正荣　俞可平　黄　平
曹卫东　蔡　昉　潘家华　薛　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20周

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作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推动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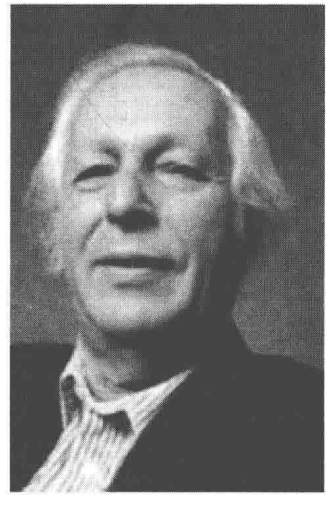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学术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作者简介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颇负盛名的学者。

1931年9月4日生于开罗。1952年及1956年先后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及法国巴黎大学统计学研究所。195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年获得经济学讲师资格。1957～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后来，一直在国外工作。1960～1963年担任非洲马里政府计划部顾问；1963～1970年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担任教授。1970～1980年担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主任。1980年起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以及世界多途径论坛主席（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简称WFA或FMA）。

阿明的著述颇丰，主要有：《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1970，2017）；《不平等的发展》（1973）；《不平等的交换与价值规律》（1973）；《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帝国主义与不平等的发展》（1976）；《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历史上的阶级与国家暨当代危机》（1979）；《今日阿拉伯经济》（1980）；《脱钩：为了走出世界体系》（1985）；《欧洲中心论批判》（1988）；《混沌帝国》（1991）；《心路历程：半个世纪的审视》（1993）；《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时代旋律的批判》（1997）；《资本主义的幽灵》（1998）；《自由主义病毒》（2003）；《为多极世界进言》（2005）；《畸形发展——对全球性失误的剖析》（2011）；《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等。

译者序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下简称《不平等的发展》）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的一部代表作，1973年由巴黎午夜出版社出法文版，1976年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英文版，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出首部中文版，台湾久大文化公司与桂冠图书公司在1990年联合出中文繁体字版，商务印书馆又在2000年进行再版，并加入了阿明当时专门为此撰写的中文版序“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在16年后的今天，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阿明教授欣然同意之下，决定再次出版这部经典之作，在当今世界局势、南北关系和新兴经济体出现诸多新因素的情况下，确属富有远见之举。

阿明是著名的国际学者，发表过一系列论述非洲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矛盾和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1970年发表的两卷集《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反映了作者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核心。

《不平等的发展》一书的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的主旨是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即“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联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全书的结构安排，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第一章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后四章谈社会主义的起源，其中第二、三两章分别分析中心和外围资本主义的规律，第四章集中说明依附性问题和“不发达的发展”，最后在第五章里作者阐明了他对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他说：“外围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行动都导致冲突，而令人有必要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他认为，

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阿明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出发抨击西方大国的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他的学术思想不但在非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欧、北美的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

阿明是研究“依附论”思潮的著名学者。这一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拉丁美洲，美国的左翼学者对此也有较大影响，尔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它主要从宏观方面探讨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批判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和发展理论，强调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主要在于它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控制和剥削，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实则是“统治—依附”结构，在这种结构内，外围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不可能出现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它们如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不可能摆脱其依附地位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依附论观点中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反帝反殖民立场以及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等方面无疑是有益的贡献。拉丁美洲当然有一批“依附论”的中坚力量，诸如巴西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拉美以外也有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从“依附论”研究拓展到更大范围的世界体系研究，阿明就是其中之一。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德裔的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意大利的乔瓦尼·阿里吉以及埃及的萨米尔·阿明，他们在学术上活跃自由，大胆争论，但对世界的基本分析趋于一致或相近，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人们戏称他们为“四人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比较重视这一国际思潮和有关学者，多年来选译出版了他们的一些名著（括号为中译本出版年份），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四卷集《现代世界体系》（2013）、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与巴里·吉尔斯）的《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2004）、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2008，2017）、乔瓦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009）以及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1992，2017）等。

本书在2000年再版时，阿明撰写了题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的中文版序，并说明是针对过去20年间出现的新形势与新问题而作。这次的最新再版，阿明又专门写了题为“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文明的末日”的新前言。两篇前言的内容非同一般，都是对此前20

年或近20年形势和问题的深入探讨与评述，是阿明对本书主题的引伸与进一步思考，可以据此进一步认识阿明对当今世界体系与全球化发展的剖析和见解。

高　钰

1988年初撰于北京

1999年补记

2016年增补改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文版序
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

几十年前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并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和激进第三世界国家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图。我这两个观点至今并无改变。只是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一场危机和全球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经验垮了台。因此，外围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正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我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的这篇序言里就要集中谈谈过去20年间出现的那些新问题。

我们看来都同意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但我们也有别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不把这种变化归纳为“冷战的结束”。我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形成战后时期（1945～1980年）生活与斗争的三种社会模式的垮台所界定的。这三种社会模式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苏联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现代化计划。

“回复”到这些模式是不可能的，这种回复的愿望只是失去活动能力的集团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表现。“重塑”也无济于事，因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今非昔比。

我们看来也都同意过去15年间经历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认为经济应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务于经济。

这种发展可以相当简单地概括如下：我们谈到的日益增大的社会扭曲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中出现很大转折。贸易中重现大规模永久性失业，福利国家衰败，被排挤和贫困化的新现象已成为图景中的永久性特点。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形势尤为显著。某些经济强劲的南方国家是少数例外，值得进一步研讨（但无论如何，这

种例外是相对的，这些国家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只是还比较克制）。

我们不同意主导观点所说的这种发展是“过渡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最终会导向使人人受益的一种新型的、据说更健全、更强劲的经济。

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种社会扭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扩张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呢？或者说战后时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种例外，那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失败以后的大国关系比之前更有利于劳动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前形势就是回复正常（即回复到马克思理论所说的积累与贫困化的法则）。

第三世界已分裂为新兴国家集团（它们已进入工业时代，甚至具备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和贫困化的、被排挤的国家集团。具体如下。

（1）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首先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加上中国大陆，正在取得加速的增长率，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这些国家（地区）都在积极地竞相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产品。这些国家（地区）除了经济强劲以外，受严重社会扭曲的影响较少（这一点需要按各个实例加以界定和讨论），脆弱性较少（由于东亚所特有的地区内部关系的加强，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共同体内部的情况），并且具有国家有效干预的特点，在推行全国（地区）发展战略方面起关键作用（即便这些战略转为外向）。

（2）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工业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它们的地区一体化较差（拉丁美洲为20%，而东亚或欧洲共同体为60%），国家干预较不一贯。这些地区的增长率仍然较低，已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强化尤为突出。

（3）总的说来，非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仍然陷于过时的国际分工。它们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是由于它们没有进入工业阶段，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工业脆弱无力、缺乏竞争力。这里的社会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贫困化和被排挤的人数大量增加。那里（非洲内部或阿拉伯内部）毫无地区一体化进展的迹象。增长实际上是零。虽然这个集团中包括“富”国（人口稀少的石油出口国）以及贫穷或赤贫的国家，但并不包括积极参与形成世界体系的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真正且十分贫困的。

区分活跃外围国和贫困化外围国，并不完全看它们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政治差异。活跃外围国中的主导力量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不论其社会矛盾如何）都有计划目标和实现的战略。中国、韩国的情况

显然就是这样，某些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国家计划同帝国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帝国主义目前主宰着世界，而这种对抗的结果将形成明日的世界。另外，贫困化外围国则既无计划（尽管诸如伊斯兰的政治讲话作出种种口头主张）又无自身的战略。其结果，它们的思想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左右，帝国主义掌握着为这些地区提出“计划”的绝对权力（例如非加太—欧经共联盟，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计划，欧洲含糊的地中海计划），这些计划事实上不受任何当地计划的反对。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全球化的被动对象。

这些国家集团之间不断增大的分野打破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结束了万隆时代（1955～1975 年）的共同战线战略。

可是我们将看到，对于如何评估资本主义在前第三世界国家扩张的性质与前景，并没有总的一致意见。有些人认为，最强有力的新兴国家正处在“赶上”的过程，不再是“外围国家”了，即使它们在世界等级层次中仍处于中间水平。别的人（包括我）认为，这些国家代表未来的真正外围国家。中心—外围的相对，从 1800 年到 1950～1980 年间，与工业化经济和非工业化经济之间的对立相合，在今天则以新的、不同的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对西方大国掌握的五种垄断进行分析来加以界定（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信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贫困化地区的情况怎样？这种现象是有历史先例，还是相反地体现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永久性倾向呢？（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权力对比较少不利于整个外围地区而暂时有所抑止。）有论者认为这种例外情况是由于第三世界——尽管组成的国家多种多样——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方面，在有关初级产品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推行自身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大国对此力图阻止）的政治意志方面的“团结”。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均衡，所以第三世界的凝聚力和团结力都被消蚀了。

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声称“别无选择”，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所谓理性和效率要求。我们认为，资本（即“市场”）必须被迫适应人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东西是什么？

今日总的经济形势中的若干主要特点已经被界定并且得到认真研究。

因此，我们如果勾画出最重要的那些特点，那就够了。

（1）同一基本选择——新自由主义——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大国和欧共体内部，这些选择涉及对确定目标的取消管制，更加放松劳工市场，对私有化不加限制（包括对传统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强调反对通货膨胀（以收紧银根政策和提高实际利率作支撑），不加限制地放开国际资金转移，等等。在许多南方与东方国家中，这种选择由于实行严厉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得到强化。然而，这种一般性说明必须受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限定，那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以及较低程度的东南亚），它们实际上没有参与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这些国家（地区）实行了其他国家弃而不用的坚持一贯的工业化政策，政府干预对这方面的要求提供大力支持，所以实际上是“有计划的”。

（2）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而东亚再一次成了例外。其征象包括：虚弱的经济增长（许多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贫困化地区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生产投资疲软，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稳，同时“非正式”就业活动增加，等等。我们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加剧。经济持续停滞，虽然官方仍在集中谈论“衰退”与“回升”。

（3）出现金融化现象，即短期、投机心理占了上风而牺牲了有利于生产性投资的长期选择。

（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政策也随之从属于这种无约束的全球化冒险，这由于基本的新自由主义选择而无法控制（灵活的汇率、金融自由转移，等等）。

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几乎在各处造成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经济：某些部门、地区和公司（特别是大跨国公司）增长速度强劲、利润丰厚，而其他则处于停滞、后退或解体状态。劳工市场则四散分割以适应这种形势。

我们再问一句，这真正是一个新现象，还是一种多速度系统，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常规的呢？这种现象只是在战后时期（1945～1980年）因例外的原因而有所减弱，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推行了有计划的政府干预（在福利国家、苏维埃国家和万隆时代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它通过组织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而方便了增长的普遍化和生产力的现代化。

这些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带来了决定性的长期效果。

（1）大公司当然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发展。但是，可以正确地指出，大公司演变的某些方面是新的。直到现在，大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首先是（特别就资本拥有者而言）全国性公司，其活动则超越了母国国界。为了公司的调度部署，它们需要本国政府主动、积极的支持。今天，它们已强大到可以不考虑（有时是反对）政府政策的设想来发展自身的扩张战略。所以，它们要政府政策从属于它们自身的战略。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掩盖了这个目标，把保护这些公司所代表的私人利益这一特有目的合法化。要求的“自由”并非人人享有的自由，是公司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完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和不诚实的。

（2）另外，更加直接地关系到当前的技术革命，工作进程现在正发生极大变化。装配线生产（泰勒制）正为新的形式所取代，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认识。这里我们也发现与劳工市场四散分割有关问题的重要因素。

金融化可以被分析为危机的产物。过剩资本在现存结构下无法从生产系统的扩大中寻找出路，对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资本大规模贬值的危险。所以，危机治理要求提供金融出路以避免这种最坏可能的结果。高额利率、灵活汇率、第三世界与东欧国家的外债、美国的赤字、私有化与养老金金融化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但是，奔向金融化并不是解决危机的出路；相反，它导致陷于停滞性螺旋之中，因为它使分配不平等更加恶化，并迫使公司玩弄金融游戏。就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化并不仅仅是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主宰的同义语；它还意味着各公司管理阶层把金融设想放在主导地位。

我们在上文各方面都可看到的东西方之间新的分裂，肯定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提出挑战。

“亚洲奇迹”值得大书特书。亚洲（或亚洲/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新兴的中心取代欧洲/北美主宰世界的地位，中国则正成为明天的超级大国。

比较冷静地说，“亚洲奇迹”使人们认为值得认真关注，虽然我感到有些仓促。这些看法质疑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中固有的两极分化理论（这一理论往往不幸地混同于对“依附论”的庸俗解释），也质疑作为对付两极分化挑战的脱离战略。据说有证据说明赶上是可能的，而且认为通过积极

参与全球化，这更有可能实现（对这种论点的庸俗解释，这最终意味着出口导向战略），认为幻想式的脱离造成了苏联的灾难。

所以，内部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可以说明有些国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积极塑造世界的一员，而其他国家则一败涂地，陷于违背自身意愿的贫困化和脱离主流的境地。

如果我们要在讨论这些复杂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对内部社会结构以及对世界体系中活跃力量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不想做不花力气、不得要领的论战，那么那样进行使问题明晰则更为可取。例如，我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主要是该制度的社会选择（“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积极而有节制地参与全球化，同以出口优先为基础的经济战略是有很大不同的，两者建基于不同的内部统治社会集团中。东亚国家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使对外关系从属于内部发展——换言之，它们拒绝“适应”世界范围的主导倾向。事实上，这就是脱钩的定义，有些性急的读者把它混同于闭关锁国。

两极分化，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不能一劳永逸、毫无改变地作界定。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同对比，它的表达方式肯定也变化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受到外围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迫使中心国家适应外围国家工业化（不管多么不均衡）带来的变革。这个事实能否以此肯定所谓东亚正在“赶上”中心国家的说法呢？这个结论未免操之过急。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导向非常不同的结论：通过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行动，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形式的两极分化，使得强大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中国如果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的话，也逃不脱这种演化。

关于欧洲建设的问题，也必须在这种全球架构内重新加以评估。我感到遗憾的是欧洲左翼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往往局限于欧洲的范围，或者最多是西方大国的范围。除此以外，只能听到一些善意的希望（特别是关于南北关系的主题）。

（1）欧洲建设问题是作为一个共同市场计划开始的。在世界经济扩张阶段（直到1975年前后）中这项计划容易取胜，现在当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后，这个计划就越来越困难了。我认为，超越共同市场走向多方面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首要优先应是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可是，政治一体化同坚持本国现实相冲突，而且欧共体各国的左翼（以及右翼）在这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